

# 康熙、梅文鼎與「西學中源」說再商榷

王揚宗

(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)

本文首先依據滿漢合璧本《三角形推算法論》，推論其年代為 1704 年，而非 1689 年稍後；其次簡論康熙、梅文鼎在傳播和論說西學中源說上的相互影響。梅氏本「述聖尊王」之旨而論中西曆算關係與康熙的倡導，是促成「西學中源」說在清代廣泛傳播的關鍵。

關鍵詞：康熙、梅文鼎、西學中源、《三角形推算法論》

## 壹、前言

「西學中源」說萌發於明清之際，後來經過康熙帝的提倡和梅文鼎的論證，成為欽定的論點，影響於清代學術甚巨。然而對於康熙帝何時開始提倡此說，以及其與梅文鼎的關係，現今學術界尚有不同的看法。筆者十餘年前曾就此略作探討<sup>1</sup>，揭出康熙四十四年（1705）康熙南巡迴京途中召見梅文鼎面諭「西學中源」說，從而使梅文鼎轉而大力宣揚和論證此說的一段故實。但關於康熙帝所撰《三角形推算法論》的年代以及康熙、梅文鼎所論「西學中源」說的異同，學界先進持有不同的看法<sup>2</sup>。《三角形推算法論》的年代原是清楚的，本無需申論，但因此而影響人們對康熙、梅文鼎「西學中源」論的認識，則有待探討。本文擬就此再略作論述。一孔之見，仍望讀者不吝賜教。

## 貳、《三角形推算法論》的年代

康熙的《三角形推算法論》是一篇在「西學中源」說的傳播史上起到過非常重要作用的文獻，收入其《御製文集》第三集卷十九。關於該文的年代，筆者曾經根據金福的論文<sup>3</sup>而以爲發表於康熙四十三年（1704）。但金先生認爲，這是「康熙帝天算學入門後

<sup>1</sup> 王揚宗，〈康熙、梅文鼎與「西學中源」說〉，《傳統文化與現代化》1995年第3期，第77-84頁；〈明末清初「西學中源」說新考〉，載劉鈍、韓琦等編《科史薪傳——慶祝杜石然先生從事科學史研究40周年學術論文集》，71-83頁，瀋陽：遼寧教育出版社，1997。前一文發表時，多數參考文獻被編輯者刪略。

<sup>2</sup> 韓琦，〈君主與布衣之間：李光地在康熙時代的活動及其對科學的影響〉，（新竹）《清華學報》新26卷第4期（1996年）421-445頁，特別是422，439-441頁；韓琦，〈白晉的《易經》研究和康熙時代的「西學中源」說〉，《漢學研究》卷16第1期（1998年），第185-201頁；祝平一，〈伏讀聖裁——《曆學疑問補》與《三角形推算法論》〉，《新史學》卷16第1期（2005年3月），51-84頁。

<sup>3</sup> 金福，〈清初改曆鬥爭與康熙帝天算學術——《御製三角形推算法論》試析〉，《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（自然科學版）》1989年第1期（科學史增刊），第16-22頁。

的自編或口述算書」。他對於該文的確切年代置而不論，似傾向於認為是其早年之作。有的研究者則根據該文的一個「內證」，認為應作於 1689 年稍後。這個「內證」來自下面這一段話：

康熙初年，因曆法爭訟，互為訐告，至於死者，不知其幾。康熙七年閏月，頒曆之後，欽天監再題，欲加十二月又閏。因而眾論紛紛，人心不服。皆謂從古有曆以來，未聞一歲中再閏。因而諸王九卿等再三考察，舉朝無有知曆者。朕目睹其事，心中痛恨。

凡萬幾餘暇即專志于天文曆法，二十餘載，所以略知其大概，不至於混亂也。<sup>4</sup>

有的研究者以為，在康熙八年（1669 年）平反欽天監冤獄之後的「二十餘載」，當為 1689 年稍後，即 1690 年代初，也就是康熙帝向耶穌會士學習西學之時或稍後<sup>5</sup>。此一「內證」似乎毫無可疑，其實大可推敲。

眾所周知，康熙初年的曆獄一案是康熙帝崇信西學的直接原因，但在 1690 年之前，他「萬幾餘暇即專志于天文曆法」的時間卻有限得很。別說「二十餘載」，就是十年也沒有。在曆獄平反過後不久，康熙曾經一度向南懷仁等傳教士學習西學，但歷時不過兩年。而他真正認真學習西方的天文學和數學，卻是在平息三藩之亂幾年之後，也就是白晉、張誠等法國傳教士于 1688 年到達北京以後，尤其是 1689 至 1691 年間，也不過兩年多。可見「凡萬幾餘暇即專志于天文曆法，二十餘載」之說並不準確。

那麼，是否可以把《三角形推算法論》的寫作年代定為曆獄平反的「二十餘載」之後，也就是 1689 年稍後，即大約在 1689 至 1691 年之間或 1692 年左右呢？

《三角形推算法論》一文收載於康熙《御制文集》第三集，此集收入康熙帝在康熙三十七年至五十年間（西元 1698—1711 年）的著作<sup>6</sup>。這個年代，至少與康熙平反曆獄相差三十年，而非「二十餘載」。可見所謂「二十餘載」只是一個誇張的約數，不能視此為曆獄的平反與該文的撰著的時間間隔，以這一「內證」將《三角形推算法論》推論為 1689 年稍後所作也與《御製文集》三集的年代不符，因此不足為憑。

現知《三角形推算法論》的最早刊本係滿漢對照《七本頭》七種之一，為滿漢合璧本。此本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有藏，該館著錄為康熙四十六年（1707）刊刻<sup>7</sup>。此本為滿漢文對照，文後有滿文識語，正文連同識語共 11 葉。其幾處文字與《御製文集》三集本略有不同，但僅為同音替代字<sup>8</sup>。滿漢合璧本最可貴的是文後的滿文識語，對於

<sup>4</sup> 《康熙御製文集》第三集卷 19，臺北：學生書局影印本。

<sup>5</sup> 韓琦，〈君主與布衣之間：李光地在康熙時代的活動及其對科學的影響〉422 頁；韓琦，〈白晉的《易經》研究和康熙時代的「西學中源」說〉，187 頁；祝平一，〈伏讀聖裁——《曆學疑問補》與《三角形推算法論》〉，74-75 頁。他們對於此說與《御製文集》三集的年代之不符不予討論。

<sup>6</sup> 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第 1299 冊，156-157 頁。

<sup>7</sup> 這個刻本並無明確的年代標示，但《七本頭》中的《潘氏總論》有滿文譯者和素寫於 1707 年的序言，刻本的年代即由此推定。

<sup>8</sup>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滿漢合璧本與《御製文集》三集本的最大差異即前引「內證」的關鍵一句，滿漢合璧本為「即專志于天文曆法一十餘載」，但這是由於印本脫去一筆所致，滿文仍為「二十餘載」。

推斷該文的年代至為重要。金福的論文已加以識讀，筆者近期也再次核對過，轉引如下：

康熙四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，內外給事中、郎中以下主事以上官員，聚在乾清門，交王大臣、三貝勒、五貝勒、八貝勒等閱漢本。……滿繙繹於那日晚點燈後。旨意亦要繙繹，拿出校，遂在乾清門繙頭等稿片，二等稿片。奉旨：今日滿漢本封一處，二十五日抄入內，皇上閱。……記錄員外郎 臣 和素。<sup>9</sup>

可見，《三角形推算法論》先有漢文本，在將該文交給王大臣等王公貴族和大臣們奉讀的同時，即命譯其為滿文。漢文本在康熙四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（1704 年 11 月 21 日）公之於眾，而滿文譯本也是在這一天翻譯的。康熙之重視於此可見一斑。該文既如此重要，很難想像康熙會藏諸篋中十多年之後才翻檢出來。

曆獄之爭使康熙崇信西方天文學和數學，但他著手評定中西曆算學之是非則在 1689-1691 年進一步學習西學之後<sup>10</sup>。不過，康熙於 1692 年 2 月在乾清門「講明律算之學」，卻是批駁中法之不可信。正如李光地說：康熙于「古法原不考求，當是看古法多迂闊可笑」<sup>11</sup>。這種態度，與後來他採取宣揚「西學中源」說的策略差異很大。因此，筆者認為《三角形推算法論》的年代為 1704 年。此不但符合《御製文集》三集的年代，也與康熙對中西學態度的前後變化是一致的。僅以一個「內證」斷定其為 1689 年稍後撰成的理據不足。

### 參、康熙、梅文鼎「西學中源」說的異同

梅文鼎雖從中法入手研究曆算之學，但他對待西法與認同滿清王朝的態度與王錫闡等遺民學者大不相同。康熙十八年（1679）特開博學鴻詞科試以〈璿璣玉衡賦〉，梅文鼎雖然沒有被推薦與試，卻自作〈擬「璿璣玉衡賦」〉一篇，鼓吹「中西吻合」，認為時憲曆「亶後來之居上」，阿諛「唯我聖朝，度越千代，正朔初頒，適逢斯會」，嘲笑堅守中法的人為「豎儒兮固陋，謬執古兮非今」<sup>12</sup>。因此，梅文鼎雖然熟悉王錫闡等人的著作，瞭解「西學中源」說，卻並沒有附和他們的以「西學中源」而貶低西學的議論。他先是附和徐光啓和傳教士的「中西吻合」論，後來又提出一種「中學為西說之權輿」的看法，其目的在於溝通中西，以息中西之爭。「權輿」（萌芽）說雖與「西學中源」說很接近，但避免了直接論述源流關係。他進而批評說：「彼驟聞西術而駭，與尊西太過而蔑視古法，皆坐不讀書耳！」<sup>13</sup>這是 1699 年梅文鼎在杭州請毛際可為自己作傳時，讓毛氏寫入其傳記中的話，也就是梅文鼎在被康熙皇帝召見之前對於中西曆學關係的「定論」。梅文鼎的這種觀點，在他應李光地之邀而作的《曆學疑問》（1691-1692 年作，1699

<sup>9</sup> 金福，前引論文，20 頁；《御製三角形推算法論》，8-11 頁。

<sup>10</sup> 拙稿〈明末清初「西學中源」說新考〉，76-77 頁。

<sup>11</sup> 李光地，《榕村語錄續集》（繆荃孫藝風堂鈔本，北京國家圖書館藏）卷十三〈理氣〉第 29 頁。

<sup>12</sup> 《續學堂詩文鈔》，3-6 頁，合肥：黃山書社，1995 年。

<sup>13</sup> 毛際可，《梅先生傳》第 4 頁，見知不足齋叢書本《勿庵曆算書目》附錄。

年印行)中作了較詳細的闡述。毛際可所撰梅文鼎傳記中的話,就是對《曆學疑問》一書的中西曆學觀的總結。

《曆學疑問》闡述的中西曆學觀,正是針對清初曆爭而發。其要點在於既承認西曆之所長,認同清朝用西法的合理性,同時又認為中國具有悠久的曆法傳統,不可忽視。梅文鼎折衷中西的觀點,得到了許多人的贊同。如萬斯同說:「此書出,而兩家紛紜之辨可息」<sup>14</sup>;李光地在該書序中則稱賞「一書之中,述聖尊王兼而有焉」。因此,1702年康熙南巡之際,直隸巡撫李光地將《曆學疑問》向康熙進呈是大有深意的。而「天縱聰明」的康熙馬上就領悟到梅文鼎中西曆學觀的深意,稱其「議論亦公平」,要「帶回宮中仔細閱看」。次年,當康熙第四次南巡發還該書時,李光地試探康熙的看法,「請問此書疵謬所在」,康熙答以「無疵謬,但算法未備」<sup>15</sup>。可見康熙認同了梅文鼎對中西曆學關係的看法。再過一年,康熙即發表了《三角形推算法論》,開始宣導「西學中源」說。這種轉變,不可能不受到梅文鼎的影響。

而梅文鼎在受到康熙的賞識,特別是1705年康熙召見他,面諭「西學中源」說<sup>16</sup>之後,則徹底倒向「西學中源」說。《曆學疑問補》就是梅文鼎在受召之後,系統地論證「西學中源」說之作。梅文鼎的論證牽強附會,失去其一貫信奉的「平心觀理」<sup>17</sup>的治學態度,因為「西學中源」說本來就沒有過硬的證據。祝平一博士比較了《曆學疑問補》與《三角形推算法論》的不同,認為《曆學疑問補》是「文鼎諷諫康熙恢復中法正朔而作,其立場近於中法派,與康熙認為西學雖中源,但西學較優的立場不牟」<sup>18</sup>。此論發人所未發,令人一新耳目。

康熙論說「西學中源」除了《三角形推算法論》這篇短文之外,往往只有片言隻語,從未深入論證,而梅文鼎作為曆算專家,對中西曆算的關係有系統的討論,兩者有所不同是很自然的。然而如果誇大他們的差異,難免有悖於史證。

梅文鼎在接觸到西方曆算學之後其研究以西法為主,他一再申明西法「後來居上」(見前),在《曆學疑問補》中也承認西人測算之精。從梅氏詩文看來,他在受康熙召見之後,一再附和康熙宣揚「西學中源」,其目的與康熙無異,都是為平息中西聚訟起見。這些詩文為讀者所習知,此處不再列舉。總之,康熙對梅文鼎倒向「西學中源」說的作用是難以否認的。

至於梅文鼎批評時憲曆改用定氣注曆<sup>19</sup>,堅持中法的正朔,則是他的一貫立場。早在《曆學駢枝》和《曆學疑問》中已反復強調。如《曆學疑問》卷一〈論中西之異〉稱:「西法亦有必不可用者,則正朔是也。中法以夏正為歲首,此萬世通行而無弊者也。」

<sup>14</sup> 萬斯同,〈送梅定九南還序〉,引自楊向奎《新編清儒學案》第一卷,第218頁,濟南:齊魯書社,1985年。

<sup>15</sup> 李光地,〈《曆學疑問》恭紀〉,見《梅氏全書》本《曆學疑問》書首。

<sup>16</sup> 詳見拙稿〈康熙、梅文鼎與「西學中源」說〉。按據焦循《里堂道聽錄》卷八記載康熙與陳厚耀問答語,康熙曾說:「梅文鼎算法也祇曉得一半,朕教他許多妙法」。可知召對期間,康熙還向梅文鼎傳授了西式算法。參見:漆永祥《國朝漢學師承記箋釋》,678-679頁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年。

<sup>17</sup> 毛際可,《梅先生傳》。

<sup>18</sup> 祝平一,〈伏讀聖裁——《曆學疑問補》與《三角形推算法論》〉,51頁。

<sup>19</sup> 黃一農已指出梅文鼎在這個問題上與王錫闡一致,見其〈從湯若望所編民曆試析清初中歐文化的衝突與妥協〉,《清華學報》(新竹),新26卷第2期(1996),頁189-220。該文注96、104所引《曆學疑問》實為《曆學疑問補》。

該卷還有專文〈論回回曆正朔之異〉，〈論夏時為堯舜之道〉，論述西法正朔不可取，而中法正朔「不可易」<sup>20</sup>。梅文鼎的這些看法，早經康熙批閱，屬於「無疵謬」之論。既然如此，自無待梅文鼎再來「諷諫」。《曆學疑問補》的有關論述，語氣還不如《曆學疑問》那麼堅定，惟在技術上更為細緻，特別是就恆氣定氣和置閏等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討論。至於梅文鼎的這個意見何以沒有被採納，篇幅所限，本文就不作討論了。嚴敦傑先生曾說：「梅文鼎對幾何及三角的研究大都仍用舊有的勾股來概括它，對天文學也只用舊有的曆法的眼光來要求」<sup>21</sup>，已經指出了梅氏囿於中國曆算傳統對待西學的局限。

#### 肆、結語

綜而論之，梅文鼎的中西曆算關係論在清代的流行不是偶然的。梅氏「述聖尊王」，在認同清代行用「西洋新法」的合法性的同時，強調中法傳統悠久不可全廢，以息中西之爭，主動迎合清朝統治者的需要。而李光地進呈《曆學疑問》和康熙的品題，以及隨後不久康熙召見梅文鼎，則是促成梅氏的中西曆算觀被接納和廣泛傳播的關鍵，如果沒有康熙的提倡，梅文鼎不可能倒向「西學中源」說，「西學中源」說也不可能在清代學術史上產生廣泛的影響。

#### 參考文獻（請補幾條參考文獻）

---

<sup>20</sup> 《曆學疑問》，7-8 頁，10-12 頁，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94 冊。

<sup>21</sup> 嚴敦傑，〈梅文鼎的數學和天文學工作〉，《自然科學史研究》8 卷第 2 期（1989），99-107 頁。